回归古典德性

□任剑涛

浏览《男性气概》全书，作者曼斯菲尔德时时处处请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镇场”。在谈论男性气概接近终局的时候，曼氏已经将自由主义、尼采式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一一请出场来，证明与之或亲近或疏远的女性主义，都未能处理好男性气概这一问题。处理好这一主题的进路，似乎只剩古典德性论了。他断然指出，男性气概是一种德性。理解这一点，需要溯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即便当今的大学少读古典，疏远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但也不影响他们指引人们准确理解男性气概。

一

原因首先在于，二人“生活在充满男性气概的希腊社会”，那个社会惟一的德性就是男性气概。“人的德性就是最好的人所做的；他的完美就是德性的标准或指导。”因此德性必是理性的、反思的、有意的，而不是自发的。面对德性，生物学与进化论作为有限。人与动物不同，对人来说的自然不是本能或自发地产生的。18世纪以来，人们将德性视为自然自发的德性，这是一个缺憾。人通过自发的自利的看法，将人看低了。无论是达尔文在科学视角，或是斯密在市场视角这样看待人，都成问题。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一个可以统治肉体的灵魂，它一部分源于肉体，一部分高于肉体。较高的统治较低的，较低的激情与欲望可能出自自然自发，但理性与抱负可以控制它。人的自发性与反思性同在。自然是复杂的，“反思给了人们方向、渴望、偏见和品格，不管这些东西有多少缺陷或多么前后不一”。人的自然，一方面是自发的，另一方面是最好的，足以控制自发，当然也可能误导。

其间，卢梭在《爱弥儿》中创造的角色，显现了两性之间的不可或缺、相互依存，也承诺了性的重要性。这与女性主义相似。男女性格特征有别，但男性对女性反抗时表现出的强大，并不是对女性的征服。反倒是女性表现出的温顺，成为他们掌控男人的规则。男性的不忠与女性的忠贞蕴含着两性关系的丰富含义。在野蛮状态下，男女因循自然匹配；在文明状态下，男女依据教育与自然互相塑造。这与科学的主张不同。女性主义只要寻求性别和谐，就会跟随卢梭——女人不能自认低人一等，得推进自己的优势，免于被人看低。不过卢梭仍然看重两性分工，而忽略外在差异，以至于女性还被置于从属地位。

斯多亚主义的“依据自然生活”，注重内心自由，不将幸福系于外在的东西，即便像囚徒般生活，也可以获得男性气概般的自信。这是一种强硬的男性气概，只有在小说家克莱恩描写的士兵弗莱明身上才可以获得理解：逃跑时以小人物自我开解，获得荣誉时以英雄自居。男性气概需要决断，尤其是在意义受到威胁的时候，更其如是。自然即自发、培养即塑造的两个极端，都不足以让人做出捍卫意义的决断。自然不能完全自发，培养不能任意进行。以人类的善为自然，它就要引导培养；以呵护善之自然为目的，培养就必须遵循自然的等级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出于自然就是政治动物。政治是自然的，但需要约定成分。出于自然，人们需要建构共同体；建立城邦，则是为了实现最高的善。以此为由，希腊人自认自己优于野蛮人，这个非科学的流俗之见，一定程度确实反映了人类对更为优越的渴望，以及他们出于自然地具有了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的自觉。寻求最佳政体是政治动物即人的目标，但因为它需要太多德性、太多哲学，人们常常缺乏相应的认识能力和足够的现实推进力量。于是，柏拉图的“血气”便成为一种野蛮动力。血气类似于暴躁的狗，它旨在护卫主人。它是男性气概中最强硬的一面，它没有超出自身的目的。它抵抗外来侵犯、报复来犯者。但它对同类友善，建立信任。

亚里士多德认为血气是友爱与敌意的基础：它会对朋友的恶行斗争；在恶行消失时，血气便归于平复。血气有盲目性，但勇敢是专属人的德性。后者正是古典男性气概的体现。亚氏以每个人均需具有德性而暗示了一个性别中立社会。但他在论及家庭时，以城邦的建立划界，认为丈夫不过是以统治自由人的政治方式统治妻子，以君主的方式统治孩子。这就告诉人们，男对女不是主对奴，而是男女各自有其统治事务。亚氏赞同不同的性别角色：男性走向政治，女性走向家庭。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论辩里，男性都显出了相对于女性的优势。他们都以坚定的主张寻求正义，这与女性主义的追求大不相同。亚氏认定，男女的德性表现有所不同，女性的节制标准更高，男性的勇敢标准更高。他们并不互为他者，而是同一个物种。他们需要结为一对。家庭虽比城邦更为自然，但城邦正义指导家庭关系。而男性气概对城邦的维续、外敌的抵御非常重要。在战争中表现尤为鲜明的男性气概即勇敢，需要与正义结盟，才能避免与暴君为伍。这对今天那些致力扼杀男性气概的人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在这中间，哲学性的勇敢高于政治性的勇敢，前者为后者预制了克制邪恶的方案。男性的进攻性与专心致志相联系，呈现了社会心理学家无法理解的男性气概面相。男性气概得自榜样，无法基于传授。因为男性气概不能化约为知识。不仅女性很难具备，多数男性也并不具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高人一筹的是，他们教会人们，“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尊重男性气概，同时对它的危险保持必要的警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男性气概尽力保护，同时力求驯化。这与他们生活的希腊社会相宜，当今人们怀疑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由于忽略了自己生活在尽力限制血腥与男性气概的自由主义社会中。需要在压制两性差异、忽视这种差异与尊重这样的差异三者之间，确认古典智慧的提点作用。

曼斯菲尔德于此“露出狐狸尾巴”，表现出自己谈论男性气概的保守主义立场。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毫不犹疑地重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论及男性气概的德性主张。相应体现在他对主流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讥讽性批评中，更直接地呈现在他对女性主义的似乎同情实则否定的批判中。在书中，他不加修饰地站在施特劳斯学派的立场上，倡导用古希腊古典精神矫正现代失误。读者甚至可以注意到，他的引证很注重施派学者的著作。但在书的最后，他却亮明了自己的自由保守主义的立场：承诺社会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但尽量维护变化前后值得维护的价值与行为。“为了保护女性的事业，我们需要性别中立的国家，但是性别中立社会没有尊重自由主义在国家与社会或者公共与私人之间做出的区分……女性应该自由而非被迫地选择职业，但同时她们还应该是女人。我们应该预期男人具有男性气概（而不仅仅是具有男性气概的自由）。假如我们完全自由，对自己没有任何预期，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这是一种明智的保守立场，也是一种保守的自由主张。

二

曼斯菲尔德关于男性气概的坚定主张，必然具有极强的挑战性。但就他本人的著述自白来看，他并不打算完全颠覆性别中立社会，也不打算彻底挑落自由主义的核心地位，当然也不打算毫不留情地打压女性主义。他试图调和。调和在古典与现代、男性与女性、公共与私人、制度与习惯之间进行。这是明智的保守主义不同于激进的保守主义的地方，也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思考进路。

从思想史角度看，任何调和尝试都是不讨好的。因为在思想市场中竞争的各种思想主张，既然需要以坚定的主张申述其思想，那么也就意味着论及男性气概的诸家诸派有某些难以调和的坚定主张。就像曼氏一样，他条分缕析了现代社会中关于男性气概三大流派对之的论述，却断言男性气概未曾得到应用，这颇有一竿子打死诸家诸派的男性气概。但被打者会对曼氏的断言服气吗？即便是对他温和但坚定陈述的男性气概的古典救济方案，恐怕其对女性主义的示好，也很难被女性主义接受。

曼斯菲尔德将现代国家认定为自由主义的理性国家，认为它始于马基雅维利，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高峰。不过这样的国家并不来自坚定的主张，也不依赖它，它仅仅是客观承认历史中理性进步的现实。创始者马基雅维利试图在女人气十足的氛围中唤醒男性气概，但没有很好地把握进攻性与男性气概的差异。而且由于“安全”观念的浮现，掣肘了男性气概。它简化了男性气概，为的是更为有效。这让男性气概专注于人类强大，而非善良。这可以表现明智，但无法呈现智慧。马氏之后，理性的控制概念凸显。它对男性气概不甚友好。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很多面孔中，没有一副具有男性气概。这个社会里，无论是精英领导者，还是精明的商人，都因为热衷民主，没有甚至反对男性气概。男性气概所具有的特质：当众证明自己，欢迎戏剧性，与荣誉和羞耻的联姻，不满足于合法与约定俗成的东西，喜爱战争、冒险与英雄，有时脆弱和易受伤害，喜欢炫耀别人的欣赏，慷慨但喜欢评判别人，都与理性控制格格不入。幸运的是，理性控制失败了，男性气概才有了复活的契机。

男性气概表现出重视个体重要性的特征。“人类的重要性系于人类个体的重要性”，当个体集合在一起时，人的重要性就依附于一个集合体，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党派，总之依附于一个带有专名的实体。男性气概要为我们的个体负责，个体性必须在他人面前主张出来，并反对他者，因此创造个体性就是一个政治行动，斗争必不可免。他不无私，也可能高贵地投入某个事业，但总把自我放在心上。它不同于个人主义那种将每个个体加以同化的做派。理性控制与前述男性气概的特质恰成反对。尤其是它以多样性的语言表达平等主义的正义，因此让展现多样性的男性气概得不到应用。加之男性气概的不足与过度对其得不到应用构成“内在的”障碍，需要有效拒斥这两种极端，男性气概才能得到适宜展现。在性别中立社会让男性气概得到应用，需要引入托克维尔那种分离两性，但却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理念。

循此，女性主义就不必要激进化：既不让女性主义走入极端男性气概的陷阱，也不让其误导女性。因此，改进现代社会的结果似乎显露而出：“男人将会具有男性气概，有的时候有点专横；女人将会被他们吸引，或者有点怀疑。我们也可以预见，女人将会用微笑认可男性气概，限制它的同时也给它一些事情做，或者在有些情况下鼓励它一下。我们还应该可以预见，女人将用她们女性的技艺再一次将我们编织到一起。”这幅总体上显得其乐融融的图画，有些乌托邦的味道，也有些屈就现实的意味，当然也有些迫不及待的期望之情。但这种似乎低调的说法，不仅很难得到认同，甚至招来嫉恨。

三

从总体上讲，曼斯菲尔德此书足以激怒论及男性气概的诸家诸派。这与他点评诸家得失，且有坚定的主张矫正诸家失误的论述进路相关。择要而言，一是激怒好战的女性主义。无论是温和还是激进的女性主义，多多少少都具有自觉的战斗性。因为她们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稍微缺乏战斗性，就不会站出来主张女权。曼氏全书有一条清晰的论述线索，那就是将女性主义作为重张男性气概的对立面。也难怪女性主义很难接受曼氏的论说。而像努斯鲍姆那样具有挑战性的女性学者，对其事实认知不准、不循守论述逻辑、对女性作家的解读令人厌恶、以及整本书其实缺乏的正是男性气概的严厉指责（参见《男性气概》刘玮译后记，详细论述可见Martha C. Nussbaum, Man Overboard, The New Republic, June 22, 2006），可以被看作女性主义者对曼氏的整体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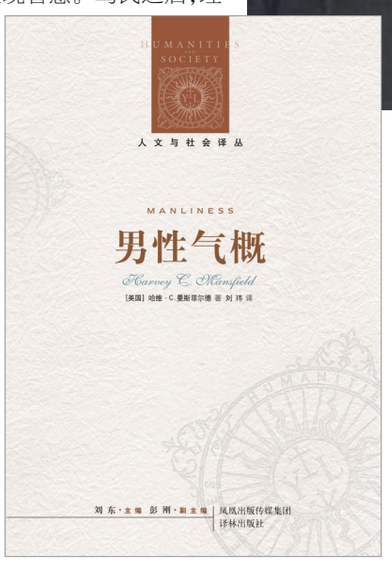
二是激怒现代主流的自由主义。如同曼氏所言，自由主义有其复杂的源流，因此不存在一个严格认同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曼氏在书中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应该主要是指自由左派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充满进步主义理念的美式自由主义。它与霍布斯、洛克、柏克时代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混合体已经相去甚远。但曼氏在书中追寻了一部自由主义思想史，几乎将自由主义与性别中立社会交替性地使用。这一方面不符合他本人对自由主义的界定，也不足以概观自由主义关于男性气概的主张；另一方面更是直接与如今美国的自由主义全力推动男女平权的进路相左。他招致自由主义的抨击就在意料之中，曼氏由此被评论者视为孩子气的好斗好战者，就不会让人奇怪。

三是激怒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自认为自己解构了宏大话语，因此对现代主张不屑一顾。但人们认为冲击力极强的后现代代表人物如拉康、福柯，曼氏颇为不屑地认为他们不过是弗洛伊德与尼采的简化版。倘若女性主义的近期论述居然依托于拉康与福柯的支持，那么，其深度与可信度就比弗洛伊德的生物性论述和尼采的虚无主义更不堪。这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一锅烩的做法，当然会激起他们的反弹。好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势头已过，曼氏不会遭到他们与女性主义结盟式的有力反击。

四是激怒宗教复魅运动。男性气概最终的依托本应在上帝。但曼斯菲尔德将自己重张男性气概的最后依托，放置在古希腊哲学上面。不提宗教的最后决定性支持，自然让曼氏的保守主义成为一种世俗保守主义，而不是宗教保守主义。这在宗教复魅运动来看，还没有走到真正反思现代癫狂的地步。因此，诉诸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不诉诸上帝或神，在宗教复魅运动眼里，自然是一种尚未到位、点到即止的浅表论述。

（本文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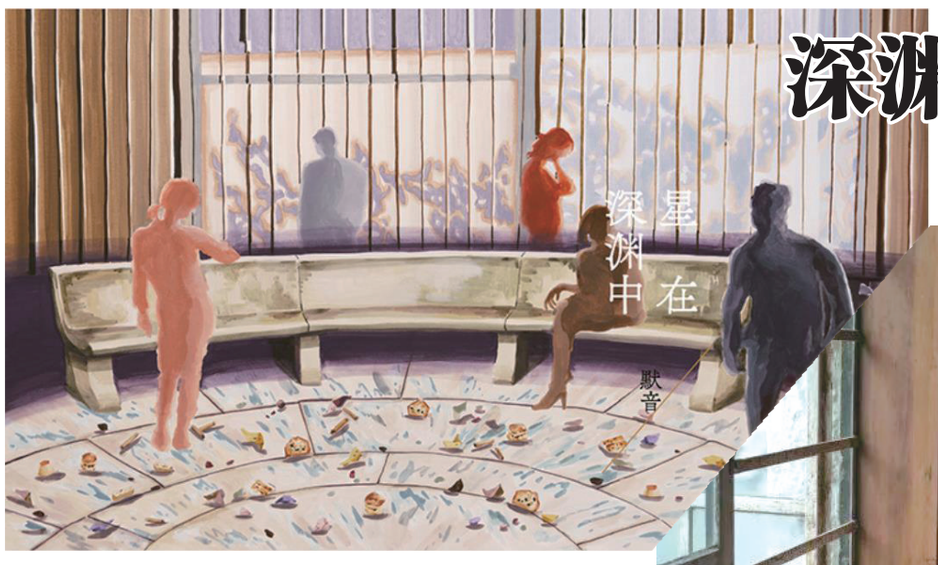
曼斯菲尔德



《男性气概》，[美]哈维·C.曼斯菲尔著，刘玮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深渊里的慈悲之光

□鲍迎迎



默音

《星在深渊中》，默音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星在深渊中》是默音辞去编辑工作之后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本写给都市里的年轻人的书，传递出新鲜的文学气息和时代感。小说以一名公众号写手陈晓燕的非正常死亡作为开篇，让读者从一开始就神经紧绷、疑窦丛生。随着警方的调查走访，陈晓燕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慢慢清晰起来。通过她的朋友、同事、昔日闺蜜等多个角色的讲述，小说完成了对陈晓燕的多维画像。如果说陈晓燕的死亡和随之而来的调查是小说的明线，那么其他几个角色的故事则构成了多股暗流，脉络纷繁，接续巧妙。默音如同一位娴熟的手艺人，为我们精心制造了一个迷局，不经意间的起承转合如同榫卯般顺滑自然。这本厚达508页的小说彰显了作者的叙事雄心，多角色多角度叙事手法的运用，一开始可能会让读者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但随着故事展开，一张拼图的不同部件块块拼接，最终构建出丰满而立体的阅读体验。

失语背后的生命阴影

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杨其星，是一位患有失语症的甜品师。讽刺的是，故事中彼此间欲言又止、无法顺畅沟通的人们，在面对这位话语无法抵达的对象时，反而常常产生倾诉的欲望。失语不仅仅是杨其星的病症，也代表了当下都市人生活中的沟通障碍。杨其星的失语是一次事故留下的后遗症，而其他人的失语或是因为有所顾忌不愿发声，或是因为过往如同伤疤，揭开太疼而不得不选择沉默。正如默音所说：“失语在这本书里是一种状态，有的时候来自受害人，有的时候来自施害者，也有的时候来自旁观者，他们都选择沉默。也有可能因为恐惧，或者想要保护某个人”。杨其星所做的甜点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仿佛能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系。这一道道甜点既是线索，又是媒介，撬开了诸位“嫌疑人”的回忆大门，让读者看到了一段段被刻意掩埋的过往。在默音笔下，甜点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食物本身，包含着制作者的情感、回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的表达。透过失语症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病况”，小说呈现了都市人的情感疏离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缺位，从而深刻地表现出当下都市人的沟通困境。

小说中最复杂的角色林同，作为一位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名噪一时的画家，本应是小说所有人物中社会地位较高、较有话语权的人，然而他在整个故事中却最为沉默。不同于杨其星因为意外导致的失语，林同和小说中其他几位人物所代表的显然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刚出场的林同似乎没有鲜明的个性，但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个个头不是很高、头发白了不少的人就像一个善与恶没有明显界线的巨大洞穴，不断颠覆读者对他的预判。曾在13岁的年纪经历过绝望的林同，背负着巨大的精神负担，一路苟延残喘，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再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看见了她。他没有踩刹车，而是加大了油门”，随后不仅默认了妻子替他背锅的安排，甚至自欺欺人地暗示自己“那是意外”。然而，名利的收获、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将他拔出泥沼，黑洞般的过去慢慢将他吞噬。虽然他对陷入深渊的女孩黄依然伸出援手，努力想要寻回生命中善的和光明的一面，但是杀害自己深爱的人所带来的拷问和煎熬，使得他根本无法得到解脱。终于，一直逃避的林同在最后勇敢了一次——生活对于他来说，早已没有了选择。

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像被命运的手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伤害和逐步浮现的隐痛，让我们慢慢理解人物各自做出的选择。

残酷生命中的慈悲暖色

虽然小说为我们展现了生命残酷性的多重维度，但依然沾染了温暖的底色。杨树海和同父异母的妹妹杨其星一起经营一家咖啡馆兼酒吧。妹妹因为一场事故患上失语症，他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的惩罚——长期以来忽视妹妹的报应。所以，他为妹妹所做的一切，既有兄妹之谊，更是出于愧疚。杨树海也是林同的发小，两人因为共同承担着噩梦般的过去，已经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尽管他怀疑是林同杀害了陈晓燕，却几乎出于本能地帮林同清理案发现场留下的痕迹。“他为什么要清理自己女朋友被杀的现场呢？简直就像被什么附体了似的。而他很清楚那个什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来自过去，驱之不散的暗影。”这样的保护让人动容。杨树海是孤独的，对于关爱是渴求的，所以对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杨其星和林同，他都是用生命去守护的。当林同在冲绳自杀后，虽然杨树海显得异常平静，但是杨其星感觉“哥哥的一部分像是永远留在了那里”。

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黄依然的遭遇，则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艰辛而温暖的救赎故事。当黄依然面对现实无路可逃时，只能在游戏《光行者》中用五根蜡烛发出内心深处的呼唤：“救我！”游戏中的“夜月”（林同）也曾处于同样绝望的处境，所以时隔多年之后的他在面对这样的求救信号时，选择扔出游戏中所有的蜡烛库存，拼出一个通向现实世界的救赎密码——一个手机号。这也成为黄依然走向自我救赎的契机。被朋友救出的黄依然，接替陈晓燕成为杨其星的治疗师，陪伴她、温暖她。黄依然在杨其星这里找到了安心的感觉。虽然绝望的洞口还在，但是“只要在店里，在这个家，洞口不再扩大”。在她陪杨其星一点点做语言训练的间隙，甚至有种感觉，“洞口得到了修复，极其缓慢的”。在小说结尾，黄依然为了杨其星的康复在继续努力。当命运呈现残忍的一面时，总还有一些肩膀可以依靠，总还有一些温暖可以期盼。

默音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慈悲，以及对那些背负创伤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同情，令人动容。正如她在分享写作心路历程时所说：“当它最终收敛定型成《星在深渊中》，乍看是部阴影丛生的小说，和我以前的作品有些不同。但是底色仍是暖的，善的。”或许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隐秘的深渊，但其中依然有光。

为当下的都市男女画像

《星在深渊中》是真正的城市文学，不仅仅因为作者把小说的背景设置为上海，而且小说从多个角度展现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家王占黑曾表示这部小说特别值得推荐给读者的地方在于，故事发生的时空“在整个都市里既平静又凶猛地不断游移”。书中有很多元素都来源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比如公众号写手、游戏《光行者》、网红厨师、电视剧《欢乐颂》等。除了几位主人公外，书中的副线人物众多，从饭馆小老板、警察到公司老总、杂志社员工、画家等等。此外，小说中多个章节用时代感鲜明的甜点名命名：生姜司康、焦糖布丁、Biscotti、肉桂胡萝卜蛋糕、酒香提子磅蛋糕等。这些都体现了都市小说的特征。

默音的这部长篇是写给和她同时代的人阅读的。这部有着多位主人公的小说，关注当下新上海人的心灵史、成长史，为读者描绘了一幅都市男女群像。正如文学评论家何平所言，“默音是‘70后’‘80后’新上海人的造像者，故事里的人和出入王安忆、金宇澄书中的那些男性、女性不再相同，同时代人的文学还是要靠同时代的人来完成”。小说以凶案调查为线索，以失语症为象征，呈现了互联网时代都市人身处精神孤岛的困境。默音笔下的主人公之间的每一次沟通都不完整，所有重要的话都没有说出来，但是他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沟通欲望。这也触动我们思考：“当语言被掩埋在黑暗深处，有没有其他途径，能让我们找到表达彼此的路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不是你我的故事，也可能正是你我的故事。希望同时代的我们都能够有共鸣。

（本文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编辑）

译林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